

朱正琳

里面的故事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朱正琳

里面的故事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里面的故事 / 朱正琳著.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7

ISBN 7-108-02304-0

I. 里... II. 朱...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64929 号

责任编辑 汪家明
封扉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5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6.125
字 数 116 千字
印 数 00,001—10,000 册
定 价 15.00 元

目 录

还有精神（代序）	3
----------	---

上篇 组合叙事：那年头那地方

墙：里面和外面	11
铁窗岁月	20
号子风物	32
饥饿的概念	44
犯人格	54
醒不过来的梦	68
留不住的歌	78
一个幸运儿的哲学	86
太平洋的故事	99

下篇 杂忆杂记：一些事一些情

白老头	115
范眼镜	123

见识了贫穷	133
来了个死刑囚徒	138
阿贵大抒情	141
监有监规	147
人是会说话的动物	152
世上闭得最紧的嘴	155
那个大年三十	157
无题	160
我出来了	169

附录

做了一回牛鬼蛇神	177
我的饥荒年代	185
跋	191

还有精神（代序）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坐过牢。没有被判刑，只在看守所里呆了近五年时间。案由是反革命。平心而论，反革命这三个字委实是抬举了我。——我几曾有过什么“反”的“壮举”？当时据说是出现了“阶级斗争新动向”，各地公安机关就都需要物色一批“新生的反革命分子”。我之入选，也不是因为我恰好具备了某种特征，而只是因为我碰巧进入了挑选者的视野。目力所及并且手又够得着，“得，就是他吧。”一念之间便让我入其彀中。现在说起像假的一样，当初发生时却跟真的一样：侦查、追捕、审讯……一点也不比电影里含糊。其实，假也罢，真也罢，“假作真时真亦假”也罢，真真假假都很寻常，不足为怪的。说到底，我不过是运气不太好而已。那年头运气好的人本来不多，比我倒霉的还大有人在。但是，事情临到自己头上时，那感觉恐怕就只好用现今电视广告里的一句话来形容：“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凭空地觉得自己的无辜更胜于别的人，不至于“查不清楚”。（别人或也有冤，但恐怕多少总有点儿不清白处吧？）所

以，在预审员面前便竭力地表白自己，直说得动了感情。那位预审员却不为所动，心平气和地打断了我：“你说你没有罪？那我来问你，市中心那么多人我们都没抓，为什么单抓了你？”顿时我就被问哑了，不得不假装反省。顺便说一句，那时候“反思”一词在中文里还未通行，所以不便假装“反思”。

后来我真的反省了，在牢里静静地想了好几年。那位预审员提的问题兀自缠住我，令我久久不得安宁——人终究不可能用假装来应付自己！终于我想清楚了：“那问题本该由我问他的，怎么他倒反而问起我来了！？”然而，事实上这也并不是“想清楚”的，事情原来就既简单又明白。我之所以没立即反问他，只不过是出于我不敢问罢了。只敢说“我没罪”，不敢说“你错了”。差此一步，一个荒唐的问题就变得有效了。我的“假装”与“不安”不都是由此而来么？不！我一定得问他一回！但我却不再有机会问他，因为他自打问过我以后就没再和我打过照面。依我看，准是他自己也倒了霉。反正在那个年代，这绝不是不可能的。有一回看守所的所长打电话去公安局催问我的案子审理情况，就听说管我案子的那位预审员已经“调离”（这个字眼在当时几乎意味着吉凶莫测的任何一种可能性）。再问这案子现在由谁管，回答却是：“我自己都没人管！”那位所长也奇，居然把这段对话原封不动地都告诉了我。一字一句我听得真切，刹那间心里亮堂堂的：天底下哪有这许多问题！有道是，你问我，我问谁去？！

乍一进得牢门，就有人告诫我：“既是来了，就得准备长期呆下去。这地方和任何地方都一样，有好人也有坏人。”惊疑间，再端详那些“同犯”（对不起，牢里人是这样互相称呼的），只见一个个面色苍白，神情执拗，笃笃定定地坐在地板上，仿佛屁股已生了根。问一问他们入狱都有多久了，报出的数字不由人心不惊：三年、五年、八年、十年……更有一位“老革命”已足足坐满了十五个年头！据说他在解放前夕曾率一地下党小组入台湾，返回时却只剩下他单身一个人。解放后没几年，他便因涉嫌叛徒而被“拘留审查”。实际上这案子当然是无从查起，因此有位看守人员不无幽默地对他说：“你的问题呀，等台湾解放了再解决吧！”他好像也安心等着这一天，只顾活着，从不问今夕何夕。开始时我总以为自己不可与他或他们那些人同日而语，渐渐地才明白，在处境上我和他或他们其实是绝无二致。问题确实变得很简单：世界也许极尽荒唐，生存也许毫无意义，可日子还在，你过不过？

过。不称天常之道也不称人伦之道，不假希望之名也不假绝望之名，横下心来过。老莎翁不是早就有言在先：“我们坐牢磨日子，也要磨它几朝天子几朝臣？”一位老囚徒说得更好：“犯人有犯人格。”

忽一日却蒙恩获释，好半晌都反应不过来，差一点没问：“牢里面那么多人你们都没放，为什么单独放了我？”但我毕竟飞快地就重新混迹于市中心，试问满街的人，又有谁能看得出我曾一度

从他们当中消失？倒是有那么几天，一些亲友喜欢围住我问这问那，那光景很像是如今的“出国归来”。原以为坐牢的日子不过是生命中的一片荒墟，不曾料在旁人眼里也会是一笔财富。记得有一个问题是这样问的：“你坐牢的最大感受是什么？”问话人显然对我的这份经历有几分羡慕。换到现在，我也许就会对他说：“你问我坐牢的最大感受是什么？我告诉你：是难受！”然而那时候我还年轻，冲口而出的回答却是：“精神生活是有的。”问话人许是比我更年轻，似有所悟地点点头，竟不再追问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我想要是他当时有所追问，我兴许会因穷于解释而不得不讲出一个近乎完整的故事来的。

时至今日，我知道我那故事早已破碎，不值再提。好在我也非食古不化之辈，在市中心混久了，自然又另有一种“最大感受”，那就是：“钱是最性感的！”只是有时候无端地会心生狐疑：“我习惯于安全地在市中心走来走去已经有多长时间了？”望着街头过往匆匆的行人，我总在揣度：他们当中或也有人和我一样，悄悄地藏有一个残破的故事，不时地惦记着？就在面部表情最为淡漠的那一瞬间，某一片断已上心头袭扰——

也是一位“反革命”，在看守所里呆了八年之后被判了有期徒刑二十年。去劳改队服刑的前夕，他忽然慢悠悠地给我讲起一则往事：“想知道我被捕时的情景么？那天我正在家里做饭。我家只有两口人，我母亲和我。母亲每天要去上班。我那年十九岁，因为学校已停课，就常在家里帮母亲干点儿家务活。那一天呐，米

饭刚上灶，居民委员就来找我，说是派出所的同志要和我谈谈话。我说等米饭煮熟了马上去。居民委员却不依，说：‘就讲两句话，你回来时这水不定还没开呢！’于是我就来了。这不，大概再有十二年我就能回去了。”停了半晌，他又说了一句：“说来你不信。这八年间我老惦着那锅米饭，只怕是锅都烧坏了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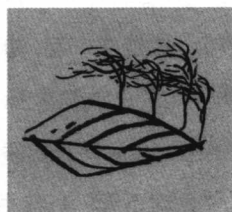
这些年来我所惦记着的是不是也是这样一锅米饭呢？想不起来了！好多事都想不起来了。

偏是时常会想起那位“比我更年轻”的问话人以及我们之间的一问一答。不过，也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这“一问一答”在记忆中竟与一段相声拉扯在一起，拆解不开了。那段相声里说，山东军阀韩复榘当年在一次纪念孙中山先生的大会上演讲，照着秘书写好的讲稿念到最后便开始颂呼口号，不料却将“总理精神不死”！喊成了“总理不死”！秘书在一旁急了，赶紧小声提醒一句：“还有精神。”韩复榘不慌不忙，跟着也大喊一声：“还有精神！”

.....

是的，还有精神。有时候这真是一个令人难堪的事实。而且，无论你是小声说还是大声喊，恐怕都有点来不及了吧？

1990 年写于德国汉堡



上篇
组合叙事：
那年头那地方

墙：里面和外面

世上有墙，有了墙，就有了“里面”和“外面”。“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墙总是用来挡住“外面”的人的，只有一种墙是例外，那就是监狱的墙。被那道墙挡在“里面”的人，“墙外行人”的令人心动恐怕就有胜于苏东坡当年在墙外听“墙里佳人笑”的感觉。“他现在应该已爬上那道坡了吧？”有人在里面这样议论一位刚刚获释的伙伴。我竟有如读到一句好诗，被它的美逼得热泪盈眶。当然，那时候我恰好也在里面。那道坡离我很近又很远，就像我那刚刚逝去不久的童年。然而更加令我悄然神往的是那行走，一步一步，往上往上，真愿意那条路没有尽头。

我第一次从外面面对那道墙时，只差一点便要发声赞叹：好高的墙！那是二十八年前，一个晴朗的早上，在公安局“连续作战”（受审）三天之后，我的心情分外松弛，好似被送往疗养地一般。我模糊地意识到，墙里面有我的同类，我不会再像在公安局里那样形单影只。

墙根儿前还有一道石梯，拾级而上，才是通往里面的门。那门仿佛矗立在半空中，墙于是显得越发地高。按照指示，我提足中气大喊了一声“报告”，那门便咣当一声（实际上是两声）猛然大开，响声清脆激越，直冲云霄。然后是门旁“武装”（囚犯们这样称呼守卫监狱的军人）的断喝声：“进来！”事实上开门声和断喝声难分先后，一时间我只觉余音缭绕，赛过了山间古刹的暮鼓晨钟。恍然间又觉得自己是在演电影，不折不扣地入画了。垂着头（同样是按指示）我从虎视眈眈的“武装”身边走进了，里面是另外一个世界。一声“报告”，效用竟好似阿里巴巴的一声“芝麻开门”，待到要出这道门时，这一声同样是少不得的。

“里面”和“外面”是囚犯们的习惯用语。其实恐怕也是一般人的习惯用语。某人被捕，人们的说法总是“某人进去了”；某人获释，人们的说法总是“某人出来了”。但对于坐牢的人来说，里面和外面的区别是绝对的，不会因“语境”（上下文？恕我借用了个时髦用语）的不同而引起歧义。高墙之内是里面，其他地方都是外面。安徒生有个童话故事说，院子里一共只有一只猫和一只母鸡，它们的口头禅是：“我们，和这个世界。”——仿佛它们就是这个世界的一半。坐牢的人说起话来，都有这种气概。

细想起来，这种关于里面与外面的绝对划分，很类似于人们对“家”的态度。家永远是“里面”，其他地方永远是“外面”。也许我们只能说：这“里面”不是那“里面”，入狱与回家不会是同一种感觉。然而我也曾见过这样的人，把鞋一脱（进门脱鞋是

囚犯们为维护室内清洁而制定的室规，与时下装修得很好的私家住宅的规矩一模一样），便大喊一声：“我回来了！”这样的人自然是曾经到过里面的人，通常被称为“二进宫”者。在我坐牢的那个年代，到过里面就与里面结下了不解之缘，很少有人真能回到外面的世界中去。在世人眼里，那道墙（可以被叫做“劳改释放犯”或“关押释放犯”之类）把到过里面的人永远地挡在了里面。因此，“我回来了！”这一声喊可说是发自肺腑，不是故作惊人之语。

“风都吹得进来，火车都拉不出去”，这是墙内智者总结出来的一条哲理。前半句只要刚一进去就能明白，后半句则需要漫长的岁月来证实。从外面进到里面，不像是穿过了一道高墙，倒像是一“失足”（外面常用的一个词）就掉进一个洞里。掉进去你才知道，里面有那么多先来者，那么多蠕动着的身躯和生命。在外面的时候，你几乎未曾收到过这些生命的任何信息。在里面你则可以想像，外面的人大都不会觉察你已经掉了进去。他们匆匆忙忙或者悠悠闲闲地从洞旁经过，你屏息以待，不知道是担心还是希望他们当中有人一不小心也掉了进去。当然，最强烈的希望还是自己有幸能出得洞去，因此洞外的任何一声响动都会揪紧里面每个人的心。这种希望很少能被岁月磨钝，它总是那么尖锐，你不可能感觉不到它，因为它仿佛会时常划破你的内脏。

沙俄时代的民粹党人薇娜·妃格念尔出狱后曾写过一本回忆录，巴金先生将其书名译作《狱中二十年》，并指出直译当译作

《当生命的钟停摆的时候》。二十年的光阴被视为一个休止符，这委实让人难以接受。可是，大多数坐牢的人都有这种暂时感，认定只有出了这道高墙，生活才会重新开始，而且是只要出了这道高墙，生活就会重新开始。薇娜·妃格念尔出狱后又活了几十年，在十月革命之后还出任过某博物馆的馆长。值得一说的是，她的博物学知识完全是在狱中学到的。我想她并不真正认为生命的钟曾经停过摆，否则她就不会写下那本感人至深的回忆录。依我的体会，生活在里面并没有中断，出狱也并不意味着重新开始。重要的是你到过“里面”，这个事实会改变你的一切。或许我们可因此反过来理解柏拉图的“洞喻”：没有到过洞里的人，无从看到生活的真相。

我恐怕是扯得太远了，而且议论也过于“宏大”。还是回过头来讲我自己的小故事吧。进得那道门，高墙内首先呈现在我眼前的是一个大院子。我的第一感觉是：还真够宽敞的！院子就是院子，本无可道处，偏偏我却觉得那院子有些异样。后来我才明白，这异样的感觉也并非无中生有。那院子的特别之处在于：水泥铺成的地面白晃晃一大片十分耀眼，没有一棵树，没有一蓬花，没有一根草，也没有任何支架、绳子、电线杆之类的物事……总而言之是一个无物可攀援、无处可藏身的场所。四周的高墙因此更似垂直的井壁。当然，头顶上有蓝天，高墙挡它不住。坐井观天，不时可见白云飘过，方知外面的世界还没有消失。顺便说一句，后来我一听见文人骚客们近乎夸耀地谈论“去